

建制民族誌「為何」書寫？
探索建制民族誌的系譜、方法特質與挑戰
齊偉先*

Revisit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onceptual Roots/Routes,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by Wei-hsian CHI

關鍵詞：建制民族誌、支配關係、文本中介、斷裂、女性主義

Keyword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ruling relations, textually mediated, disjuncture, feminism

*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研院社會所

E-mail: whchi@gate.sinica.edu.tw

摘要

本文試圖從經驗研究操作的角度爬梳建制民族誌的特色，並說明建制民族誌的可能限制。首先，從理論系譜的角度切入，揭示建制民族誌在發展系譜上所傳承的內涵，說明它如何傳承及調整馬克思理論傳統、俗民方法學以及傅柯的論述理論。同時從研究對象設定及方法特質，說明建制民族誌這研究取徑的特色。接著本文從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面切入，指出台灣相關經驗研究所透露出的建制民族誌的可能限制。具體指出在反抗議題和文化議題上，現有的建制民族誌研究並未能對此有所回應，藉此說明運用建制民族制所可能面臨的限制與挑戰。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up to capture the analytical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E), while illustrating the potential conceptual limitations encountered. First, I begin with the theoretical tracing of IE and its conceptual roots/routes, including how IE works with and against Marxist tradi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Foucauldian discourse. Meanwhile, I characterize the methodology of IE by explaining how and what IE is implemented. Next, I culturally contextualize IE and its practices with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and show the potential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particular, I argue that the notion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re under-theocratized in the analytical landscape of IE and needs to be better accommodated. This shows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challenges while practic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導言：由女性視角發展出來的洞見

建制民族誌研究者在闡述建制民族誌的基本理論立場時，常提到 Dorothy Smith 曾自我告白式地說明她在職場上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以及同時身為一個家管母親的斷裂經驗 (Smith 2005: 11-13)，這個斷裂所指涉的，是她察覺自己作為一個家管的親職角色，日常生活深受學術建制環境影響及支配，並且強調這些影響及支配，在一個由白人男性所建構出來的研究建制環境中不被看見，也無法被看見。透過這個斷裂經驗，Smith 試圖說明有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女性的主體性無法被體現。但她由此所開展出來的建制民族誌理論，是否因而只是一個奠基於女性觀點的研究方法？此方法真的只關乎性別嗎？早在 1990 年代就已引發許多這樣的質疑，討論她企圖發展的理論及方法恐不只限於女性觀點 (Lemert 1992: 64; Doran 1993: 45)。後來，她在 2005 年出版的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一書的第一章 “Women’s Standpoint” (〈女性的立場〉) 中，曾花了不少篇幅說明歷史上女性在公共論述中被排除的「弱勢」角色 (Smith 2005: 13-20)。Smith 承認自己受女性主義論述的啟發，讓她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自身的職場身份，發掘了自己身為女性的主體身份。但這反省也同時將她越帶越遠，帶到一個不能只限於性別觀點的訴求。是以 Smith 在這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書中，明確地表明建制民族誌非只關乎性別 (22)。社會中與女性的處境相似的其他許多身份，特別是社會弱勢者身上，也同樣可以發現類似的斷裂。在這些反省中，Smith 在理論上確立了將「支配關係」作為研究主要的揭露對象，原本從性別弱勢角度切入的洞見，也就逐漸跳脫性別視角的侷限，成為在各類弱勢者、甚至在建制體系中任何人身上都適用。而今，女性處境在 Smith 的理論框架中更像是一種弱勢的隱喻，由歷史脈絡投射出來的一個隱喻。因此 Smith (2005) 明白宣示，必須將 a sociology for women 轉化到常民，進而提出 a sociology for people。

雖然Smith在申論中是以自己斷裂經驗為例子，但她同時強調，基於女性立場的反省不只關乎性別，而更關乎支配關係，可以說，建制民族誌企圖透過主體經驗來掌握背後隱存的支配關係。因此，所謂的弱勢不是由主體的社會位置來判斷，而是在支配關係脈絡中被支配的意義指涉，不同主體的斷裂經驗代表的是支配關係在不同主體實踐中所產生的一種感知，透露出的是一種「弱勢」位置的感受。換言之，弱勢不是由社會特徵(如階級、性別等)來判斷，而是在支配關係的脈絡中所呈現的被支配位置。

Smith自己曾表明：「我不是符號互動論者、也不是現象社會學者、馬克思社會學者、或俗民方法論者」(1987: 9)，但無疑地，Smith所企圖發展的理論架構及方法論深受這些理論的影響。本文試圖說明，建制民族誌分別承繼以上不同理論的哪些特點，藉以說明建制民族誌的基本理論立場及方法特性，並從台灣相關研究所觸及的方法議題，探究建制民族誌在文化議題及反抗議題上可能切入的方式及限制。本文的主題：建制民族誌「為何」書寫？這個提問同時提的是「為什麼」(why)及為「什麼」(for what)兩個面向。前者要問的是，建制民族誌是在甚麼發展脈絡下出現的，這是一個理論系譜的議題；而後者要問的則是，建制民族誌為「什麼」及為「誰」而寫，這涉及了建制民族誌書寫的對象與方法特質。本文將從這兩個面向提出說明，並在文章最後，討論建制民族誌書寫對象的選擇及可能的限制。

一、建制民族誌的理論系譜與理論立場

(一)左派系譜：意識形態與物質性

Smith在早期的著作中，很明確地表明她發展的理論與方法，乃借鏡馬克思的思維(Smith 1975a, 1981)，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社會關係的理解。Smith認為馬克思處理的是政治經濟學和真實社會關係之間

的關連，強調人們各種不同的生產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基礎。Smith指出，馬克思將人們實際生活中與生產關係相關的具體詞彙，如薪資、商品、資本、獲利等，理論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中(1981: 318)，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並沒有讓「實際發生的社會關係」因概念化而被隱匿。因此她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架構體現了真實社會關係的影響及展現，而不是將社會關係視為解釋社會結構的(功能性)抽象概念。換言之，Smith眼中的馬克思所論述的是在真實的社會生產關係中成形的政治經濟結構，而非抽象性的結構指涉，沒有和人們實際日常生活的活動脫鉤。就這意義而言，Smith自認她的理論與方法承襲了馬克思理論的特性(1981: 319)。

另一方面，馬克思唯物論的理論基調當然是Smith作為一個承襲者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若追溯Smith理論框架中的物質性(materiality)討論，大致呈現在三個文脈中。一個是她挑戰body/mind的二分架構：body在她看來是社會意義生產的重要基礎，因此在方法上她強調談主體性及支配關係時，不應脫離身體的物質性，她指出應將分析回歸常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活動，而由此說明背後體現出的支配關係，並強調這是一種打破body/mind二分的方法(Smith 2005: 24-25)。另一個脈絡則是在「工作」(work)這意義下談物質性：在Smith的思考中，「工作」指涉的是各種需要技能的實作(1987: 165)，換言之，她所謂的工作並非僅是組織內或在僱傭關係下的勞動行為。她視工作的重要性勝於勞動，同時也從馬克思對經濟性生產的強調，轉向技能元素。技能元素涉及的是與物質性相關之實作領域中的指導、傳承等機制，因而涉及了相應所需的文本中介(textually-mediated)的社會實作脈絡。第三個涉及物質性的脈絡，就是所延伸出的有關「文本」的論述：她認為「文本」具有一種不同於主體特質的物質性內涵(1987: 69, 166)，它可以被複製、重製，它在主體之外但影響著主體的建構，並且可以跨地產生影響。Smith曾引用馬克思的話，說明馬克思的物質性強調一種經

濟面向的依賴性(dependence)，她順著這個依賴性的思路，將「工作」的經濟性依賴，轉而理解成另一種新的物質性依賴類型，亦即對「文本」的依賴。「文本」的物質性體現出Smith理論架構中，是形塑主體和支配關係背後重要的物質基礎。

以上列舉說明了Smith自己有關傳承馬克思的說法，但若仔細比較兩者，很容易發現他們之間卻仍存在許多差別。例如，我們會發現，前述Smith所提的物質性論點，與馬克思談人與物之間的理想關係這個核心關懷並不相同，她的論點並沒有涉及太多馬克思式對人／物關係的浪漫式想像及情境預設。此外，建制民族誌談工作的勞動時，也並非以經濟生產的角度切入。雖然他們之間存在以上這些立場上的差異，但我們卻又能不時在她的思維架構中嗅到建制民族誌有鮮明左派的色彩，如Smith談支配關係、弱勢立場等，這些都看得到左派的影子。但到底在何意義上我們可以確認它的左派血統呢？

左派(廣義包含傳統左派及新馬)目前已很難再以唯物立場或生產關係作為公約特色來標示其特質，這兩者在經歷新馬的論述調整後，都被視為是較為次要、甚至是不合時宜的標籤。而尚能維持不變的卻是「真／假」之辯，不同左派立場之間的公約特色，足以用「真／假」之辯及其衍生的價值訴求來說明：左派公約的基本立場隱含了有「(被隱匿、不被意識到的)真實運作／(存於意識中的)虛假認知」這個基本的差異概念。也因此，將人從虛假認知的意識中喚醒，認識到那個被隱匿而不見的真实運作就是一種具價值的使命，這也可說是左派的「批判」精神。建制民族誌是否有這個特色呢？Smith在行文中所談的支配關係，用她的話說，是「外於個體」影響著主體如何透過自我客體化的過程來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建構主體的方式)，因此支配關係是主體內化於自身而不自知的基礎(2005: 69)。如同Smith所談的「普遍性的偽裝」(masquerade of universality)，是她在工作勞動上進行學術領域中制度文本的對話過程中武裝自己、偽裝在普遍性(制度化)的價值下

(虛假部份)。同樣地，建制民族誌理論脈絡指出，文本讀者(text reader)對於文本的生產機制、連結影響及傳遞機制雖未能有清楚的認知，但卻忙於與文本進行對話(text-reader-conversation)，並在對話中受其支配(104-108)。因此能揭露這支配的支配關係，就如同喚醒被支配者認識到那被匿而不見的真实運作。

如果依「真/假」之辯的區分來對建制民族誌中隱藏的內涵進行整理，可以摘要表列如下：

- 客體化的主體(objectified subject)／全人的個體(integral individual)
- 跨地性(translocality)／在地性(locality)
- 文本化(textualized)／身體性(bodily)
- 文本中介的工作(textually mediated work)／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在Smith的討論脈絡中，前者往往指涉的是虛假、「異化」的部份，而後者則指涉具有完整、真实的存有特質。依此，建制民族誌確實有左派「揭露」虛假以突顯真实的實踐意涵及批判精神。

(二)理論特質：主體、論述、支配關係

Smith因承襲了馬克思的思考路數，早期的文章不時會提到意識形態(Smith 1975a: 355)，Smith認知意識形態為一種權威式力量的基礎(Smith 1975a, 1975b: 365; Doran 1993: 49)。但在後來的申論中，她往往藉助「論述」(discourse)概念來說明，以致理論建構的發展逐漸倚重「論述」，因為她發現使用論述概念結合語言的分析較為方便、也較直接(Collins 1992: 75)，所以逐漸以論述取代意識形態這個被廣泛使用的詞彙，但相關分析則一直維持「支配關係」這個存有預設。

正因為Smith藉助論述概念來說明，因此在她談「支配關係」時，很容易讓人連結到Foucault所談的治理性。事實上Smith在1980年代發

展自身的研究路數時，雖使用了 Foucault 的論述概念，但她將重點放在文本所鑲嵌及中介的組織化社會關係，換言之，Smith 企圖分析的對象不是論述本身，而是論述如何實際發生影響的過程（1990: 162）。因此儘管 Smith 同意 Foucault 的論述概念，但她認為 Foucault 所開展出來的理論立場，並不能用來說明個體的實作。所以她不完全承接 Foucault 論述概念的（後）結構主義特質，不試圖在結構層次上談結構性權力（power）（161）。其中一項關鍵原因在於，Foucault 的「治理性」與「論述」展現的是一種具結構關聯性的解釋基調，這兩個概念描述的是一種結構性權力的展現，進行的是一種鉅觀層次的描繪。因此當 Foucault 談身體時談的是規訓的身體；談主體時談的是治理環境中主體結構化出自我認知的權力過程。如果說 Foucault 的「治理性」／「論述」是一組基礎概念，那在建制民族誌的脈絡中相應的概念組就是「支配關係」／「文本」。

在 Smith 的「支配關係」與「文本」概念組中，看似「支配關係」也像是在說明一種治理性：透過組織化或制度化的過程，創造了各種客體化角色來形塑主體認知。但 Smith 更強調的是這客體化的主體（Smith 作為教授）之外的另一種主體存有（Smith 作為母親）的探究，強調要直接切入微觀層次 agent 的日常生活及實作。Smith 所談的文本，不是強調它作為一個意義結構的關聯整體，而是強調它的媒介功能。不論文本或由之所產生的支配關係，在 Smith 的討論中都不是以客觀的意義結構來被理解，而是強調它是制度化環境運作的重要媒介基礎。至於此制度化環境如何實際產生影響效果，還是必須回到主體行動者間的實際互動來掌握。Smith 認為，從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才能具體彰顯支配關係的影響；換句話說，支配關係無法脫離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而被以一種外於主體（群）的存有形式來被掌握及理解（2005: 183-185）。因而，支配關係並不能決定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及具體實作。主體有被「喚醒」，而對被支配的事實發展出自我意識的可能，這

與 Foucault 有關鍵性的差異。就這意義而言，建制民族制的理論基調是偏向建構式的，有別於 Foucault 的後結構特質。

(三) 方法上特質

1. 建制與文本

在方法上，Smith 曾明確地區隔了她和馬克思的不同，她引入了描述工作的自反性思考，強調語言活動本身的影響。也在這點上，她認為馬克思並沒有很清楚意識到社會關係中實際發生的語言及論述層次的語言兩者之間複雜、模糊的關係 (Smith 1981: 333)。Smith 曾認為俗民方法學反而在這點上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指出描述社會關係的描述者本身同時身處於社會組織化的框架之中，亦即反省到「社會組織建制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無可避免地總在描述中『現身』(“present”)，亦即描述活動必然依賴它，儘管它未必會被明確地看到」(1981: 334)。她後來將這個方法論上的反省，連結到「論述」概念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來，Smith 在後來接受 Foucault 論述概念的同時，便走出不同於俗民方法學的路，走向一種預設存在支配關係的分析路數，也在這點上，她劃出了和俗民方法學在根本立場上有所差異的界線 (Campbell 2003: 12)。

Smith 主張，社會關係的建制化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在現代社會的情境中，建制體系的運作意味著一種新權力機制的具象展現。當 Smith 在 1987 年首次明確定義建制 (institution) 的指涉內涵時，僅強調它具有支配性，尚沒有提到文本中介的特質 (1987: 160)。但在 1990 年之後，「文本中介」則逐漸被確立為 Smith 標示現代社會情境下，理解建制的重要特徵：

以文本為中介所產生的論述，代表著現代社會的獨特特性。現代社會的存有方式，是社會中組織化的溝通及詮釋實作，結合在常

民日常生活世界中，並同時對之進行結構化，這運作模式在經濟及政治過程中促成了社會關係的建制化發展(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1990: 163)

Smith明確地認定文本中介的社會關係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在2005年《建制民族誌》這本具里程碑意義的代表著作中，這個立場甚至被正式標舉成理論名稱。**建制**在她的理論框架中，標示的是現代社會中，廣泛受文本中介而產生跨地域(trans-local)、超越地域(extra-local)的影響力。Smith(2004)認為，這是一個馬克思在其所處的年代尚未遇到的社會條件，因此馬克思自然不會將之視為是現代社會的特質。而當Smith接受並沿用轉化Foucault的論述概念，並將文本中介的特性視為是論述結構的微觀運作基礎時，也就同時將「論述」在現代社會中的普效性特質擴及應用於「文本中介」，而將「文本中介」正當化為足以標示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質(Lemert 1992: 68; Collins 1992: 74)。

Smith的理論雖然預設現代社會跨地的、超越地域的影響力，但她在方法上，因特別強調從微觀日常生活的實作中來掌握及揭示支配關係，所以支配關係及支配權力的圖像無法以全觀的方式被揭露，她堅持支配關係必須、也只能在研究脈絡中被凸顯及掌握(Smith 2005: 68-71)。由此可見，她關心的不是結構(包括論述結構)本身，而是透過常民片斷、但同時具體可徵的日常實作來說明支配關係的實際運作方式。但足以產生跨地的、超越地域的影響基礎為何？跨地的、超越地域的影響力在不同地域脈絡被解讀、被實踐的方式並不一定一致，因此是否有一致的(支配)權力結構？若沒有，又如何能說支配關係有跨地的、超越地域的特質？針對這個類似社會存有論的問題，Smith僅以文本這個物質性存有的普效性來回應，她認為同一文本在不同地域進行中介、產生相關的社會實作，就展現了文本跨地的、超越地域的事實，這樣的理論回應方式，無疑是採用一種文本(作為物質性存有)被

跨地的、超越地域地傳散及採用的事實來說明，但這同時也讓多元、非單一的視野成為此方法的基調(165-170)。

2. 斷裂

「斷裂」(disjuncture)是Smith方法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就理論系譜而言，斷裂的意義來自於前述左派理論的真／假之辨的立場。斷裂標示的是一種「虛假／真實」或「表象／(被遮蔽的)實在」之間的落差。這斷裂具體落實在社會脈絡中，分別有不同層次的指涉：若回顧Smith在其著作中不同段落的討論，可以發現這斷裂在早期僅強調女性經驗與女性視角並非主流論述及制度設計所能體現、能被看見的一面(Smith 1992: 91)，但在發展成為建制民族誌後，這斷裂被擴大理解成主體日常經驗與主流論述或制度設計之間的落差。由於這類斷裂會讓主體自身有明確感知，因此可以體現在主體自身的反省中。當我們將研究對象的斷裂經驗放在日常工作的脈絡中來看時，斷裂經驗也就是在身體勞動工作的物質性中發生。Smith曾表示：「存在有一個可以被描述的世界」(there is a world that can be described)(1981: 316-317)，而這個「世界」，在Smith的理論架構中，就是日常生活實作和文本中介機制之間的相互影響及運作。這是Smith認為可以被描述、揭示的真實世界。但這樣一種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其實預設有一個存在於文本之外的主體(the subject outside the text)(Clough 1993: 175)。因為有這樣的理論預設，才足以讓主體經驗成為實存的(the actual)，而在另一面那些在文本中介的活動中進行連結實作的主體，則是屬於支配關係影響下另一層次的被支配存有，這兩者之間的斷裂是建制民族誌理論特質中相當關鍵的基本立場。

基於Smith以上的理論思考，主體的斷裂經驗乃源於支配關係在「建制對象」身上的運作，彰顯的是一個主體處於建制體系中被支配的「弱勢」位置，因此「建制對象」不必然只能指涉社經地位的低階與弱

勢。在建制體系中，醫生、大學教授這些高社經地位者也同樣可以是建制支配的對象，同樣可以發現有建制民族誌意義下的斷裂感受。這除了Smith自身作為大學教授的斷裂告白可供佐證外，林昱瑄(2018)的研究也讓我們清楚看到大學教授如何成為建制對象的事實。此研究詳細地描繪了大學教授所面臨的斷裂及在建制結構中所處的弱勢位置。事實上，當Smith接受了Foucault的權力論述，並將其融入建制民族誌的理論時，「支配階級」便已不再單由客觀面的政治經濟因素所決定，如同Smith將「階級」修正理解成是社會互動中所建構的「範疇」(2009: 78-79)。一個高社經地位的人，在某些建制脈絡中，也同時可以是被建制支配的對象，也必然面對斷裂性。這是Smith的建制民族誌相較於傳統馬克思，更具多元張力的批判特性。

二、兩個延伸的關鍵議題

Smith的建制民族誌是一個有相當理論基礎及明確立場的方法，但也因為如此，在經驗研究的操作中，研究者很容易遵守建制民族誌對書寫對象的選擇及分析方向上的鮮明引導。綜合相關經驗研究的內容，筆者發現在兩個議題上，特別容易看到建制民族誌的「不書寫」，這引發筆者思考，這是否是建制民族誌的方法特質所導引下產生的結果。這些「不書寫」的範疇分別是「反抗經驗」與「文化」議題，以下將針對建制民族誌的相關研究，對這兩個議題疏於書寫的現象進行討論。

(一)建制民族誌如何可能書寫「反抗經驗」？

Smith的理論及方法由於承襲了馬克思的路線，因此鮮明地體現了具有高度改革社會的關懷與揭露真實運作的精神。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洋洋灑灑地列舉了許多採用建制民族誌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指出這些研究確實引發社會面的改造及影響。例如在加拿大種族不平等議

題、勞僱關係、環境、社會政策及同性議題上，都曾有利民族誌的研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實務上的改變(Smith 1992: 97)。在十五年後的另一篇文章中，她更明確地表示，改變是需要進入制度化的過程：

將改造運動者的經驗和其支持者的政治意識建立聯繫，是由下而上產生改變的過程中相當關鍵的一環。(Smith 2007: 23)

由下而上改變的組織化(organizing)過程，生產了如何做的知識、建立聯繫(connections)、也可以生產支配關係如何運作的知識，以及讓我們知道如何透過組織化來產生改變，而也許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讓人們變得有動力並意識到自己是政治主體。(26)

從這兩段文字，可發現Smith承襲馬克思精神的程度，可能比前述已說明的還要多。在改造社會(也可以說是對支配關係的反抗)的立場上，她主張要在改造運動者及其支持者之間建立政治意識，包括意識到自己是政治主體。這在邏輯上，不啻為是馬克思試圖喚起勞工階級意識的翻版，儘管表述的脈絡框架不同。換言之，建制民族誌在生產支配關係如何運作的知識時，就試圖創造改造社會動能的機會，也就是創造反抗支配關係的契機，這是十足具反抗及社會運動精神的實踐。

但要能產生制度性的聯繫效果，才能算得上是有改革效果的「反抗」，Smith這個嚴格的立場，等於同時排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中零星主體進行自省及反抗作為的書寫價值。在許多實證研究中確實可以發現不少這類彰顯斷裂的零星反抗作為，以台灣許多建制民族誌研究為例，許可依(2017)、張麗珍等(2017)、蔡昇倍(2015)這些研究，都曾描寫一些有自省能力，並在自己的工作上以創意變通的作為來對抗建制支配力量的行動主體。許可依的研究從社工人員的斷裂經驗切入：

社工作為承接政府家暴防治業務的一線工作者，進入到一個極度分裂的處境：一邊是社工專業所教導的「案主自決」，另一邊則是建制以安全至上定義的「個案最佳利益」。因此，「演戲」便成為社工身處在建制與案主角力中，回應建制的一種方式。(2017：111-112)

許可依筆下的社工為何「演戲」？不是為了完成社工建制體系所賦予的工作，而是對社工建制體系的荒謬性所進行的控訴回應，希望能「回到人味的社會工作」(2017：112)。這是她筆下的社工在「案主自決」專業價值的堅持下，對制度所進行的反抗實作。

蔡昇倍的研究也曾從自身作為社工的斷裂經驗切入，她表示：

在觀看Cs8的IADL分數時感到巨大迷失感與斷裂，〔因為〕來自於蘭嶼原鄉的生活經驗脈絡，無法被放入帶有西方現代生活假設的IADL中評分。(2015：127)

面對這個斷裂，在地居家服務員的實作在ADL及IADL這建制規約支配下，選擇儘可能地做一種「活的服務」(蔡昇倍 2015：78)：

若服務員們只見著ADL與IADL所呈現的生理失能個人，那長期臥床的Cy17可能因為貓狗帶來的蚊蟲讓病況更為惡化；Cy9也聽不到他念念不忘的傳統歌謠，因為這些全都是生理失能之外的需求，不會出現在建制語言所定義的服務項目中……〔在地居家服務員〕隨著案主當下的需求，給予立即的回應、填補身體失能評估看不到的環境與情緒需求，修縫案主生活起伏中的各式需要……這些額外行伸出的另類服務、金錢與時間成本，全部都是由服務員自行吸收解決。(87)

這個建制體系中看不到的「活的服務」，其實是在地居家服務員堅持案主需求下，對制度規約所進行的反抗性回應，完全不是為了完成建制要求。相反地，建制的要求很多時候是壓制這類「活的服務」的主要力量，因此「活的服務」可說是在地居家服務員在疲於應付建制狹隘的規約之餘，仍使力進行的另一種抗命實作，這種對建制的抗命力量，來自於建制代理人的一種專業良心。這類具反抗性的專業良心，也同樣在張麗珍等筆下的呼吸治療個管師的反抗實作中看得到(張麗珍等 2017: 163-166)。

這些對抗的實作雖只是在建制體系中零星的變通作為，依Smith的標準，可能還達不到有制度化的影響，因此還沒有顛覆體制的作用，但這些卻是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中，控訴體制的荒謬與矛盾的具體實作方式。若依Smith的反抗觀(2007)，這些零星的反抗或許只創造了還沒有達成橫向聯繫的契機，頂多算是創造了「如何作」的片斷可能性，但她眼中這些點點滴滴、分散在建制結構中的反抗實作，在尚未發展出彼此之間的聯繫之前，並不是值得紀錄及書寫的對象，也因此現行大多數的建制民族誌研究，大多選擇不書寫這類零星的反抗作為。以一篇美國原住民受家暴婦女的研究為例(Wilson & Ellen 2006)，文中清楚揭示了美國法律及社工體系所介入的協助與原住民因其文化背景因素所產生的斷裂，但在此文章的描述中，社工及法律體系中的人員被寫成是高度「稱職」的建制代理人，絲毫看不到他們有任何反省思考及另類作為。換言之，當研究目光鎖定於說明斷裂及揭露建制支配如何運作的同時，個別的反抗頂多只是用來凸顯建制如何粗暴、如何不合理地進行支配的橋段，至多只能象徵性地表示存在有其他可能的「契機」，此外沒有太多被描述及討論的價值。這類真實的反抗經驗，在建制民族誌的書寫中往往被不經意地忽略，即使沒被消音，也只能扮演附屬的角色。但就這個角度來說，原本源於想顛覆父權支配下被消音的女性**真實經驗**，彰顯被忽略的女性聲音的建制民族誌，最終是否真

的讓這些反抗的主體(儘管不一定是女性)的聲音被當主題書寫?許可依、蔡昇倍及張麗珍等筆下的不同反抗主體,他們對建制的荒謬所進行的精彩反抗實作經驗,其實透露出非常多回應建制荒謬現況的可能反抗路線,這些若能被更詳盡地書寫及發揮,其價值將遠高於僅被用於說明建制支配關係如何發生。

事實上,這類的反抗實作不僅只發生在建制代理人身上,更多時候是發生在被建制活動支配的弱勢者(如案主)這些「建制對象」身上。建制支配活動的實際運作,往往是由建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如案主)彼此間的互動所構成,往往同時涉及的是這兩造的斷裂經驗與他們各自可能進行的反抗實作,因此在分析上應同時兼顧各類斷裂經驗、各種可能的技能實作以及各自所施展的反抗實作。目前大部分的建制民族誌常止於指出斷裂以彰顯支配關係的存在與運作模式,而忽略了建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的反抗實作的研究價值,但筆者認為這些反抗實作的模式是提供具體進行建制攻錯的重要思考基礎。

Smith在早期曾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社會學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下的建制化學科,它充斥著「男性的調性」,也因此知識生產的對象與討論的內容忽略了女性的真實經驗(1975a: 365-367)。我們若以同樣的方式來審視近年來建制民族誌的研究,其呈現研究結果的方式大致有三類,一類是致力於呈現(mapping)日常生活和建制支配之間的連結樣態(Water 2015; McNeil 2008; Campbell 2001);另一類則指陳建制體系中理念與實際操作面落差所產生的荒謬與矛盾(Rankin 2015; Rankin & Campbell 2006; Breimo 2015; McCoy 2006; Mykhalovskiy & McCoy 2002),還有一類則企圖說明所考察的建制體系的運作,如何成為上位社會結構再生產(如階級再生產)的一環,進而指出它是更大支配關係中的一部分(Griffith & Smith 2005; DeVault 1991)。在這類基調下所操作的建制民族誌書寫,被書寫的多是「建制人」,也就是鑲嵌在支配關係運作中的、沒有體現真正主體性的行動者。而以個別反抗經驗為主

題的建制民族誌，幾乎找不到。但這些經驗不正是Smith當年試圖發展出能讓女性真實經驗被看見的方法精神嗎？這些還沒發展出橫向連結的反抗經驗，雖然零星，但不也正是有自我覺醒意識的主體實踐的**真實經驗**嗎？何以這些真實經驗反而在這些年的建制民族誌無法被強調，甚或無法被看見？若循著Smith強調要自反性地意識到社會學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下的建制化學科這一思路，或許應換位思考，同情地思索以下的可能解釋：目前學術期刊所刊載的建制民族誌文章之所以有所「不書寫」，是否可能因為目前學術期刊論文(作為一種文本)在篇幅上的限制、要求清楚結論式觀點等建制化審查過程，致使盡篩選出一些能對結構有明確批判說明的文章類型，而讓另一種談非結構性、特殊性的真實反抗經驗的文章，容易被建制自然地排除？這個自反性的思考，引導著我們反省，目前學術界出版發表的建制化環境，是否支配著建制民族誌的書寫？那麼，建制民族誌真的還走在讓排除的聲音發聲的初衷所鋪設的道路上？

(二)建制民族誌能書寫「文化」嗎？

Smith在談建制時，指涉的主要是以「文本」為媒介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化及組織化範疇，而非傳統人類學所討論的風俗、慣習等文化面向的建制結構。值得思考的是，建制民族誌如何理解傳統意義下的「文化」？

Smith在《建制民族誌》一書中申論「文本」的重要性及角色之前，詳細地論述了語言作為協構主體(language as coordinating subjectivities)的功能(Smith 2005: 75-95)。她承襲了Vološinov、Mead及Luria的觀點，將語言視為是構成個體間共構領域(interindividual territory)與形構主體性的重要基礎(95)。依照這個理論脈絡，所謂的「文化」、「傳統」被化約成為溝通、互動、實作的文化，而非一種結構性的對象。因此，依建制民族誌的理論精神，在描繪日常實作的同時已經處理了「文

化」。Smith站在上述涉及語言與主體性討論的三位學者的理論觀點基礎之上，進一步區分了以「共同生活經驗為基礎的」(shared experienced-based)及「以文本為基礎的」(text-based)日常互動與實作領域，並在此區分下，Smith將建制民族誌方法導向後者，強調「以文本為基礎的」(text-based)面向才是此方法的重點，進而發展出以文本為中介的方法論立場(85-94)。這表示Smith並非沒有意識到前者(共同生活經驗為基礎)面向的角色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性，但如同前述章節所述，在Smith的診斷中，她認為現代社會的社會關係朝建制化的方向發展，在企欲凸顯此現代社會特色的立場下，另外一類不以文本為基礎的日常實作(前者)及其所產生的「文化性」，也就在高度聚焦於文本中介的方法導引下不被看見。

Smith曾表示，文化關注的是規範，是一種整體性的秩序表現，也因為這樣的認知，她寧可將文化化約在實作中來研究：

由文本中介的論述是標示現代社會特殊性的特徵……在這樣的意義下，論述概念將「文化」所涵蓋的各種觀察，轉成真實的實作，成為可直接考察的對象。(1990: 163)

很顯然地，在建制民族誌的理論框架中，「文化」並非設定為是書寫的選項，更精確地說，從建制民族誌的角度來看，「文化」不是一個有明確指涉的概念，因此不足以成為書寫的對象。文化在成為考察及書寫的對象時，已被轉化成更具體的日常實作來理解，亦即成為在文本中介的論述環境下所理解的日常實作。藉著 Foucault 論述概念的廣泛普效性，Smith 看似在理論上解套了建制民族誌的考察範圍並不限於組織或制度範圍，而可以更廣地涉及社會的其他界域。以建制民族誌領域中廣為人知的兩本著作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Griffith & Smith 2005) 與 *Feeding the Family* (DeVault 1991) 為例，這兩項研究所探討的主題並不

(只)是在教育體制內或特定組織內的日常生活實作，涉及的範圍更涵蓋了傳統認知的母職文化。因此，這兩本著作的處理方式，確實如同前述所引的Smith的話，精彩地展演了如何將「文化」(在此指母職文化)轉化成論述影響下的日常實作來研究。但若放在非西方社會如台灣，這樣的轉換恐怕無法那麼單純，因為文本中介的現代性，就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對於非西方社會，特別是部落社會來說，是一種由外而內強加的支配性，文化與文本化的建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裂。因此對這樣的社會及社群，支配關係的研究，將不斷面對既存傳統文化的支配性和現代文本中介的支配性兩者之間的角力，這很容易從蔡昇倍筆下達悟族人的聲音辨識——「我不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

在部落中進行照顧工作時，會發現照顧與傳統的達悟文化緊密相連。許多服務員和業主之間的語言和互動模式都必須放入在地的文化脈絡下裡觀看，才能理解為什麼要以這種特定的方式提供照顧……在照顧生命跡象已經開始越來越微弱的Cy33時，就會以充滿文化意涵的話語來鼓勵他，希望激起Cy33的求生意志。[在地居服員]特別告訴Cy33現在是飛魚季……Cy33聽了便說：「我不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Cy33深知如果自己在現在去世，村落內的男人在重要的飛魚季時節就得暫停漁獵，對部落內各個家戶的維生與食物供給都會造成影響。(2015：88)

Cy33是一個去脈絡的編碼，蔡昇倍讓這沒有名字的編碼重新脈絡化在文化傳統中，因為Cy33的真實聲音「我不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只能在文化傳統脈絡中理解，而無法反映在建制文本的操作中，傳統文化的支配性和建制的支配性交集在Cy33與在地居服員身上。從Cy33及在地居服員實作所共築出的景象，當然是真實經驗和建制支配的斷裂，但也同時是傳統文化支配和建制支配之間的斷裂。

在以上的例子中，建制民族誌方法所引導的分析，往往將常民受傳統影響下的「真實日常經驗」聚焦於受建制體系影響下的面向來考察。建制民族誌將「斷裂」當成研究方法上的重要策略，關注的是建制定本中介的論述及組織化關係是如何形塑與影響相關行動者的日常實作。例如在Wilson與Pence(2006)類似的研究中，在探討美國原住民受家暴婦女在現代法律及社工建制體系的處遇時，清楚揭露了美國法律及社工體系所介入的協助與原住民真實需求之間的斷裂。但在揭示斷裂後，文章的結論僅能提供幾項原則性的建議，不脫像是應該要讓受暴原住民婦女的真正需求及聲音在建制處理流程中被聽到等這類缺乏具體內容及作法的倡議(Wilson & Pence 2006: 222-224)。建制民族誌若在描繪支配關係的同時，對影響「真正需求」背後的文化脈絡缺乏關注，或完全沒意識到對背後的文化因素的探索是提供出路的重要關鍵，自然就無法提供更明確、更具體的實質建議。若這份建制民族誌研究能同時費心呈現建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的不同反思及反抗(如前述蔡昇倍、許可依、張麗珍等研究的嘗試)，相信至少可提供一種直接面對「真正需求」的切入點。

傳統上，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會爬梳研究領域內的價值體系、社群連結模式、象徵符碼的建構、衝突及權力運作模式等，並探索這些多元面向之間的關聯性。在涉及時間向度時，也很自然會探討相關的變遷發展。建制民族誌由於並不關心傳統文化因素，因此較少涉及這類議題，這樣的切入角度就理論立場而言雖合理，但是否能涵蓋及解釋行動者的所有日常實作則是另一個問題。

若確實要能涵蓋多元日常實作，傳統文化、習俗在相關實作中的影響自然不能、也不應被忽略。我們要如何定位傳統文化、習俗？將視之為現代建制體系之外，另一種支配影響力的範疇(因此被排除而不書寫)？還是應將這範疇視為是另一種另類「文本」所中介的論述基礎？若真的如此定位，「由文本中介的論述是標示現代社會特殊性的特徵」

(1990: 163)這段Smith的話聽起來就格外突兀，顯得自相矛盾。除非我們將現代社會中的傳統習俗，視之為一種新的傳統、新的習俗，認知為有著不同的運作模式。但若相反地，建制民族誌不能涵蓋多元日常實作，則表示建制民族誌的切入取徑，有無法涵蓋行動者某些日常實作(如同前述以共同社群經驗為基礎的面向及影響)的限制，亦即無法涵蓋那些傳統上「文化」一詞指涉的面向。建制民族誌若並不十分關注這些面向，那也可以說這反映出了建制民族誌研究「不書寫」的範圍。

當研究者面對的是傳統、習俗影響十分鮮明的領域時(例如民間信仰場域)，前述的疑惑會特別鮮明，甚至在現代社會因社會分化所形成的各種次文化領域，如塗鴉文化、刺青文化等有一定社群基礎的領域，雖它們涉及的不是傳統文化，但卻是另一種本質相當不同的社會組織化型態呈現，例如沒有鮮明的主導文本(boss text)，社群間(廣義的)建制性規約相當彈性、流動，並且相當程度上這類社群仍倚賴共同生活經驗。具有這些特殊性的次文化領域幾乎是目前建制民族誌的研究完全沒有涉獵的處女地，但這些領域卻擁有更多「弱勢」、「邊陲」的民眾及族群。他們的聲音是否可以透過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來被看見？面對這些社會面向時，建制民族誌不應噤聲，而該思考如何自我定位。

三、建制民族誌的現代挑戰：從台灣社會與科技環境變遷的角度所提出的批判

Smith承繼馬克思理論發展建制民族誌的過程中，清楚地意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環境已非馬克思年代的處境，因此進行了許多概念的轉化。其中「文本中介」的建制化環境，被標示為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下，與常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特質。若將現代文本中介的建制化發展，看成是現代資本主義影響下的變化，與此同時存在但在現代社會

有類似的支配關係者，至少還有傳統習俗(鑲嵌在語言及常民既存的日常溝通概念之中)這類影響力。這類具高度文化特性的傳統，若被視之為一種特殊的支配關係，是否也適合用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來進行分析？儘管Smith沒有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它在各篇章的討論脈絡來看，至少這不是建制民族誌關心的書寫對象。這些一直仍存在現代常民日常生活中的(具支配性的)傳統習俗(或標示為「傳統文化」)，它與現代制度設計之間的扞格及斷裂，在台灣社會特別容易被看見(蔡昇倍2015)。這兩種支配力量的斷裂，在建制民族誌的引導下，很容易只專注在現代制度化環境的支配考察，而忽略傳統的支配力量，或者傳統的支配力量只是在建制民族誌的書寫中，成為分析中附帶提及、隱約提醒著讀者它仍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佈景。關注現代建制支配力量的立場，框限出我們看常民日常生活的方式及範圍，因此所勾勒出的常民主體性，也總是片面的，但用更嚴格的角度來說，這不啻為是一種理論框限下所產生的研究限制。

此外，建制民族誌在現代也面臨了另一個新的挑戰。在現代新興的溝通媒介(如社群軟體)出現之後，文本中介的組織化模式有了很大的質變，不同層次的論述大量出現，結構的不穩定性也變高，文本的位階結構已不再是過去的階層性關係。許多底層浮動的文本、稍縱即逝的文本都以另一種方式挑戰高位階文本的影響。因此支配關係不僅不能再以單數的方式理解，甚至是否是由上而下的形式運作都值得商榷。是以預設在常民日常生活實作的背後，存在有某種上位結構的支配影響力存在的這個立場，也可能造成研究視野的限制。對比於這樣的預設，另一種可能思路如Deleuze與Guattari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1980)這本著作中針對組裝(*assemblage*)概念所進行的討論，似乎提供了另一種修正的可能。奠基於組裝概念的理論路數同樣著重實際連結過程(*connectivity*)，但卻不預設一種支配的結構性，組裝出來的結構具有流動的特質。在新的中

介文本(如社群軟體)影響下的領域，建制民族誌所預設的支配結構是否還能被考察揭露，還是比較接近組裝理論所企圖揭示的具流動的結構，是值得未來進一步透過更多實證研究來確認。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林昱瑄。2018。〈追求教學卓越？台灣高教的表現管理建制研究〉。《臺灣社會學》35：59-107。
- 張麗珍、黃明華、齊偉先。2017。〈醫療場域中專業協作的順從與反抗：呼吸治療的建制民族誌〉。《臺灣社會學刊》61：135-184。
- 許可依。2017。《家暴社工，我們為什麼要「演戲」？——家暴安全網的建制民族誌分析》。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昇倍。2015。《在惡靈與國家之間，找一條照顧的路——蘭嶼居家服務經驗之建制民族誌分析》。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西文書目

- Breimo, J. P. 2015. Captured by care: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on the work of being in a rehabilitation process in Norway.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42(2), 13-29.
- Campbell, M. L. 2001. Textual accounts, ruling ac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routine conduct of community nursing work. *Studies in Cultur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7, 231-250.
- . 2003. Dorothy Smith and knowing the world we live in.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0, 3-22.
- Clough, P. T. 1993. On the brink of deconstructing sociology: critical reading of Dorothy Smith's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1), 169-182.
- Collins, P. H. 1992.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ircle: Dorothy Smith's challenge to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73-80.
-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0. *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Paris: De Minuit.
- DeVault, M.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ran, C. 1993. The everyday world is problematic: Ideology and recursion in Dorothy Smith's micro-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18(1), 43-63.
- Griffith, A. I., & Smith, D. E. 2005.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Falmer.
- Lemert, C. 1992. Subjectivity's limit: The unsolved riddle of the stand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63-72.

- McCoy, L. 2006. Keeping the institution in view: Working with interview accounts of everyday experience. In D. E. Smith (E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pp. 109-12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McNeil, L. L. 2008. Apply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o childcare. *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 4(1), 109-130.
- Mykhalovskiy, E., & McCoy, L. 2002. Troubling ruling discourses of health: Us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ritical Public Health*, 12(1), 17-37.
- Rankin, J. M. 2015. The rhetoric of patient and family centred care: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to what actually happen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71(3), 526-534.
- Rankin, J. M., & Campbell, M. L. 2006. *Managing to nurse: Inside Canada's health care refor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mith, D. E. 1975a. An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structures and how women are excluded: Considerations for academic wome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12(4), 353-369.
- . 1975b. What it might mean to do a Canadian sociology: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1(3), 363-376.
- . 1981. On sociological description: A method from Marx. *Human Studies*, 4(1), 313-337.
- . 1987.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feminist research strategy. In D. E. Smith,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pp. 151-179).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Femininity as discourse. In D. E. Smith, *Text,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pp. 159-20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2. Sociology from women's experience: A reaffi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88-98.
- . 2004. Ideology, sci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epistem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7(4), 445-462.
- .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Lanham: AltaMira Press.
- . 2007. Making change from below. *Socialist Studies / Études Socialistes*, Fall 2007, 7-30.
- . 2009. Categories are not enough. *Gender & Society*, 23, 76-80.
- Wilson, A., & Pence, E. 2006. U.S. legal interventions in the lives of battered women: An indigenous assessment. In D. E. Smith (E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pp. 119-22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Water, N. 2015.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counter-cartography of nurses' wound work.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17(2), 127-156.